

“互联网思维”不是噱头

“互联网思维”火了。就一两年的工夫,“煎饼”“小米”成了时尚大餐,银行、电信被挖了墙脚……这些原来没想过,不敢想,甚至想不通的事儿,就这么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着实让埋头苦干了几十年的实业家们颇为感叹。

然而,并不是所有实业家们都乐于接受互联网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传统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管理体系。不少企业凭借这套体系闯出名堂,甚至跃升全球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成功的优越感以及仍然不俗的业绩,都让一些优秀企业家产生了路径依赖,对互联网思维表现得不仅冷淡,甚至不屑。更有一些企业家还在炼化、妖魔化互联网思维,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营销噱头。

其实,互联网思维所追求的目标与传统企业经营理念完全一致,就是最大

程度地尊重市场。微信、余额宝、小米手机,这些创新之所以引发追捧与震动,本质上就是把准了市场的脉搏,满足了消费者长期渴望却难以实现的消费需求。

而与传统理念相比,互联网思维却能打通企业的七经八脉,使其更有能力迎合当下与未来的市场需求。互联网思维使企业鼻子更灵、反应更快,更能适应“快时代”、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互联网思维讲究平等、即时、互动,主张迅速捕捉市场异动,并快速做出反应。这无疑改变了传统产业产业链条过长、市场反馈过慢、产能有余而个性化不强的掣肘。

互联网思维使企业眼光更准,更能弥补传统产业的诸多短板。工业设计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之一。工业产品的功能与外观设计常常不够人性化、智能化。互联网思维利用大数据与开放

平台,将用户提升为设计者,使目标受众的消费喜好得以精准锁定。那些先拥抱“互联网思维”的企业,已经尝到了甜头。佛山一家小家电企业参考了阿里平台的消费大数据推出定制电烤箱,开售日销量竟超过“五一”假期3日总销量。

互联网思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使企业手脚更长,为实业家们开疆拓土、跨界驰骋打开了另一扇门,为草根创业者搭建了绕局的快速路。过去开银行的与做软件的井水不犯河水。自去年以来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财富逆袭,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快速普及,都在打破以银行为中心的传统银行体系。当潜在客户都加入设计团队,一线员工也成了研发核心,忠实消费者更自愿组成免费营销大军,这样的企业得多强大!传统企业又有何优势应对?

无论企业家是否愿意接受,互联网思维都将冲击并改变传统行业的生存现状。即便在制造业已相当发达的德国,也正在上演互联网思维贯穿的工业4.0革命。对于那些规模更大、管理制度更成熟的大企业,这种冲击恐怕更强烈。诺基亚、索尼等昔日产业领袖渐沦为市场弃儿,恐怕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读懂并运用好互联网思维,涉及生产流程、服务模式、传统业态的重生再造,绝非一日之功。只有那些先变革的大企业,才有可能避免沦为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恐龙。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以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送给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传统企业,恐怕再恰当不过。读懂互联网思维,善用互联网思维,企业或许就开启了一个好时代的大幕。

陆娅楠

国企阳光招聘是就业公平关键

据5月1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达到727万人,创历史新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文,要求促进公平就业,其中“国企公开招聘应促进司副司长桂楠表示,人社部正制定具体措施,拟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信息发布的范围、公布渠道,以及招聘工作的流程等内容,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的公平、公正就是这个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底线,如果这条底线失守,社会的公共秩序就会混乱失序,就业的潜规则便会乌云罩日。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是在国考、事业单位招聘还是国企招聘中,“萝卜招聘”屡禁不止,令很多寒窗苦读享受不到最起码的公平和正义,甚至失去了人生的上升通道。无疑,就业公平需要不断扎紧制度的篱笆,把有违就业公平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招聘的潜规则最大限度地失去市场。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设立了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公务员法》也对公务员招聘做出规范。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2号国务院令,公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条例》,条例共十章44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行政法规。条例确立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规定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无疑,条例的出台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从原人事部的部门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有利于规范事业单位招聘

程序,从而有效杜绝事业单位违规招聘。

因此,在国和事业单位招聘都已制度化规范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招聘理应尽快纳入制度化的管理和约束之中,实现阳光招聘。事实上,相对于国和事业单位招聘公开透明,国企的招聘更是问题不少,招聘不透明,所谓的职工子弟指标大行其道,导致招聘问题时有出现,不仅损害招聘公平性,也严重影响了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是代表人民运作国有资产,所以,国企的公开招聘理应尽快纳入制度的约束之中。此番人社部要求,国有企业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除涉密等特殊岗位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并且还要在政府网站发布招聘信息,报名时间不少于7天,拟聘用人员也要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等,无疑有助于破除国企招聘中的神秘化和不透明,大力压缩国企招聘中“萝卜招聘”的空间,彰显就业的公平和公正。期盼人社部正在制定的具体措施使国企招聘的信息发布公示等更具有可操作性,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更希望有关部门加大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使就业公平的制度篱笆不断扎紧、无缝可钻。

国企毕竟姓“公”,就其招聘而言,要打得雷要下雨,要做到这点,对国企的约束,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以文件或法规的形式进行约束。一、相关部门需对国企招聘加强监管,以减少或杜绝秘密招聘、暗箱操作的空间;二、一旦发现秘密招聘、暗箱操作,则要严厉处罚,并问责相关负责人,如此才能形成必要的震慑效应。只有监管与问责并举,才能促进国企招聘的公开,也才能更好地呵护就业公平。

吴杭民

“应试教育催生了部分孩子的脆弱。”18日“2014年植物日”科普活动在华南植物园举行,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在活动上作《教育使孩子成长》的讲座时表示。(5月19日《扬子晚报》)

中学生感到迷茫该怪什么

这样的脆弱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显影,都有些什么特征?就像学生自己说的,“对自己很迷茫,没有长期的目标”。许智宏另外解读此现象:“很多中学生都有这种问题,这不怪你们,怪教育体制!大家都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切皆有缘由,有它自然的结果。教育的问题是在教育以外,而学生“迷茫”的根由却还是在教育之内。瞎折腾只能带来瞎折腾混乱结果,而不能产生其他。现在看来,教育产业化是一种教育的负能量。教育变成赚钱工具,只顾赚钱,就不会顾及学生迷不迷茫。对于教育产业化操盘手来说,能把教育功能变成钱就是大功告成。

冯友兰先生说,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使人知人的应该是什么,并且使人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恃人之为善,是就人的应该是什么着想,这是教育的希望。而官场、市场、应试三位一体的教育,只能使人的灵魂更加焦虑。人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要走向哪里,不仅迷茫,还会生出无数迷惑困惑之感。

可以说,体制机制影响了教育的所有,学生的所有。譬如,功利性的教育只能凡事都沾染上功利,只能培养出急功近利、虚浮躁。进入功利境界中的人,只有“我”的观念,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着功利,为着自己的利益打算。功利成为目标,对所学就会更加迷茫。为什么去学?没钱没钱人家的孩子加倍地努力、加倍地付出,还不是为了谋到一份相对好点的工作。而最为可叹的是,这又偏偏不是一个拼能力的时代。

不单单是学生变得脆弱,家长们也要跟着脆弱;不单单是学生感到迷茫,家长们也要和他们一起迷茫。教育问题首先关乎育人的人对教育行为的理解,教育不是灌输,不是偏狭之为,而是要用自身的行为影响学生。汲取知识无疑很重要,但培养文明的理念更为重要,这才是教育的要义。

不错,中学生感到迷茫,应怪教育体制。但實際上,怪,不会起任何作用。怪不过是发现了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 今语

互称同志是一种传统。然而,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倒灌,党内称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异化。在反“四风”的当下,这个问题引起关注。日前,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5月19日《人民日报》)

称呼庸俗化的根源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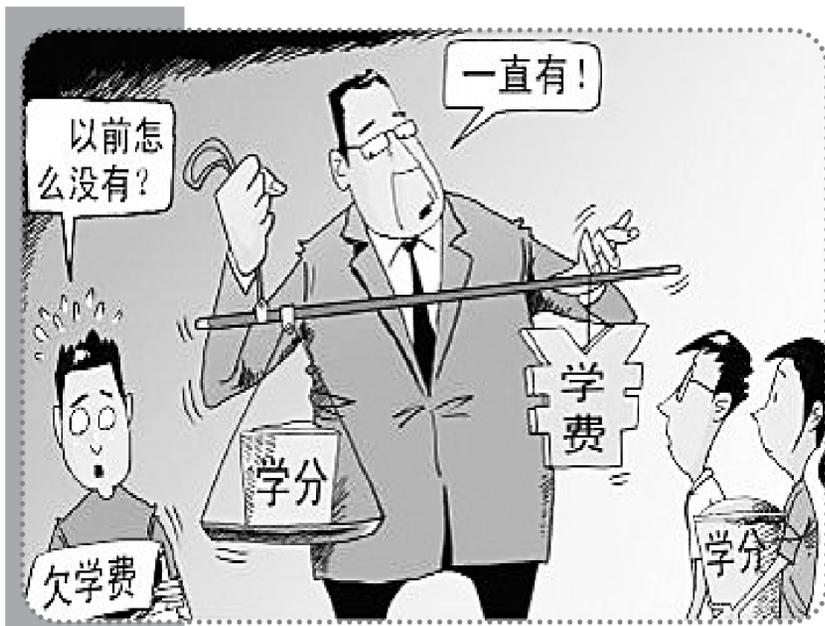
称呼本是小事,明确之事,该喊哥的,你绝不会乱叫弟弟。长幼有序的风气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在过去代表着年长者和年幼者之间的先后尊卑。但是,现在用在称呼上,无非就是个符号,无非就是个所谓的正常秩序。叫人要叫准,别喊乱,别闹出笑话。

同志是个现代传统,更远的时候也没有称同志的。称同志,意味着平等,象征着人格尊严,代表着某个阶段的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不仅党内称同志,有一时在街上这样的公众场合,不分被称呼者的年龄、职业、身份等,都是可以叫同志的。

称呼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关,人与人之间在的身份关系变了,称呼怎能不变?一切根源皆来自权力架构的变化,来自等级社会价值观所发生的某种颠覆。江湖化称呼的出现与盛行,在于称呼的地点、场域的日益江湖化。下级对上级喊同志叫不出口,上级对下级叫同志难以启齿,根源是尊卑有序尊卑有别出现了新情况新状态,既不同道又难同志的人再这样称呼,当然是相当的别扭相当的尴尬。

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称呼,发出个通知容易,但要推倒公职人员之间已形成的心理阻隔,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的内在发生机制都有特定的规律性。即便江湖化的称呼,也不是乱喊的,有叫才有应,有应才会有呼。老大就是老大,不会自我降格为老二老三。庸俗的称呼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在于“老板”“老大”们早已制造出了上下不平等的事实及这类称呼的良好感觉。

再说了,在社会上,同志一词也已发生了意义变异。过去,南京到北京,同志是官称。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现今,在许多场合,它都褪去了本意的色彩,被据曲解成另外的意思了。伊文



15日,武汉大学本科生登录教务系统赫然发现,自己欠学费了,费用从数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并要求在5月31日前交清。很多学生不明白,开学时明明已缴学费,怎么就欠费了?对此,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斐表示,学校2011年开始试行学分制收费,本应按学年结算,因系统问题才累积到现在

“黄海波嫖娼”该不该被示众

“国民女婿”黄海波嫖娼事件近日成了舆论热点。名人+丑闻+性,三重传播热点交相刺激之下,万众瞩目的公众监督。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仍未修改之前,警方依法对嫖娼者进行治安处罚,无可指责。

然而,“黄海波嫖娼事件”的执法问题在于,黄海波作为治安处罚的对象,在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等处罚之外,还有无义务接受“舆论示众”的额外惩罚?在媒体上,事件被详细披露,甚至一名据称是黄案中涉嫌卖淫的女子也被曝光了正面照片。目前虽不清楚警方在这些信息披露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但内部司法文书连同案卷照片均

被上网,显然非普通公众所为。当然,黄海波系知名演员,这类“公众人物”应受到较普通人更为严格的公众监督。

问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但明确处罚应“公开、公正”,也宣示实施处罚应“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卖淫嫖娼者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仅限于法律明示的责任。卖淫者和嫖娼者的人格尊严及其他合法权利,仍受法律保护。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通常并不公开卖淫嫖娼者的详细信息。曾有地方公安部门因未尽注意义务,而今几张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指认现场的照片流落到了网上。其时,舆论矛头直指

警方的行为系对失足妇女的“网络示众”。以“黄海波嫖娼事件”的舆情传播来看,“示众”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更有甚之。

如果这一行为被批评,本着执法公平,是否每一起卖淫嫖娼案件均应对社会进行详细公开?基于保障人权与保护人格尊严的考量,警方理应对“黄海波嫖娼事件”中的警方内部信息披露展开调查。若有人违法违纪,理当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警方无违法违纪行为,也应主动采取措施,对黄海波及涉案卖淫女的隐私进行保护。这种保护,与对卖淫嫖娼的违法性评价并不冲突。

王刚桥

危机信息不在“攻关”在公开

5月18日3时在320国道浙江省桐庐境内倾翻的槽罐车所运输的四氯乙烷泄漏25.8吨,经应急处置被拦截吸附17.8吨,进入事发地点附近溪流8吨左右,该溪流距离富春江2公里左右。富阳市从12时起暂停自来水供应,15时恢复供水。(新华社)

突如其来的车祸,祸不单行,危及富春江。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在应对这一“水危机”中,应急处理做得比较扎实,不仅表现在拦截吸附的处置以及应急预案的启动,而且表现在信息的公开透明,或者说,相关信息未受“污染”。前者诚可贵,后者价更高。

前车之鉴。4月11日,兰州主城区唯一的供水企业——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出厂水及自流沟水样被检测出苯含量严重超标。当地政府称在24小时内自来水不宜饮用。18小时后才公布超标,上报与核查真的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是否有瞒报、迟报之嫌?有人质疑,苯超标岂能“笨处理”?

危机信息不在“攻关”而在公开。在处理四氯乙烷泄漏事件上,无论是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

的官方微博,还是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都在第一时间发布适时信息。公开透明,“微博大义”,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也有利于防止谣言的传播,克服公众的恐慌心理,并且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事件的处置。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而“一滴污水”也可以检验有关部门处理危机、化解危机的“酸碱度”。危机感无时不在,尤其是水危机。水是生命之源,生机之本。每一起水污染、水危机都要让我们刻骨铭心。有人进行了拆字:“污”是“水+亏”,就是说,水污染后人类吃亏。用诗意的表达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的眼泪。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人类生存的生命之源,地球人都义不容辞。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处置“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应急处置的过程与结果都要有“胜过富春江”的追求。突发事件可能难以预料,但如何处置考量地方政府的睿智与能力,其中,危机处理的及时、准确公开是基础,也是关键。这既是管理智慧,也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

李云

高考改革应打破集中录取制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接受第九届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上表示,全国执行高考新方案,2017年英语将不再参加统一高考,一时引发议论纷纷。

需要指出的是,顾明远先生是前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他所表达的内容,并不是来自官方的信息,而是民间(或者说更多地接触到官方信息的民间)的看法,其所说的,与此前其他一些专家表达的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基本上传递了高考改革的思路——即减少科目、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多考。

目前的高考改革思路,还主要集中在科目改革、计分方式调整上,并没有触及高考改革的实质。这可能无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应试教育问题,还可能出现新问题。

有不少专家和社会舆论把英语不在统一时间考试,称为退出高考,这是不负责任的解读。退出高考的说法完全错误,即使这样实行,不在统一时间考,高考英语还是要考。而社会化考试,从目前的情况看,只

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英语不在统一时间高考,不论是计最高的成绩进总分录取,还是计等级由各校提出等级要求,都没有做到社会化考试,让英语回归本质,也无法减轻学生的负担。计最好一次成绩进总分投档,是从以前一考定终身转变为多考定终身;而高考英语计等级,高校在录取时提出英语等级要求,也不可能如大家想象,就降低了高考英语的地位,在集中录取制度框架下,教育部门要按一定的规则集中投档,如果一本院校都提出英语等级要求为A,那些英语为B的学生就无缘一本了,而这些学生以前还可以通过其他科目把英语分数拉上去。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改革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出现更严重的应试倾向,薄弱学校不重视不计分数的科目(因为各地会以计分科目分数划一本线)、农村学生进名校更难(英语等级低)等等。

很显然,问题出在集中录取制度上。我国高考制度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考试,而是

录取——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由教育考试部门制定统一的投档、录取规则投档,把所有学生纳入一个评价体系,但回顾过去10多年的高考改革,对集中录取制度改革甚少,总是在科目改革上做文章。

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应该是学校自主认可考试成绩,学生自由报考。进一步说,只有高校实行自主招生,才有考试社会化的可能。

包括顾会长在内的很多专家,还把高考视为指挥棒,希望改革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起到更好的指挥棒作用。不得不说,这种指挥棒思路,对高考改革是很危险的。高考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淡化高考指挥棒作用,把考试的地位从以前主导中学教学、大学招生,转变为为中学教学评价和大学招生服务。

这就要求实行学生和高校双向选择的高校自主招生,如果能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各校自主提出对申请学生的学科和成绩要

求,也就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为中学开展多元教育,拓宽了空间。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设想的高考改革,都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都继续把高考作为指挥棒,并不想撼动指挥棒的位置。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这就要求打破“招考考一体”的格局,彻底治理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做到招考考分离——中学按照自己的育人目标,自主教学,大学按照自己的培养目标,自主招生,考试则完全社会化,由学校自主认可、学生自主参加。只有如此,我国基础教育才能从招考考一体化中走出来。可以说,国家层面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可是具体落实却发生了偏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减少科目、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多考等改革,都要和考试招生分离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改革的效果。

熊丙奇